

所罗门的瓶子

王晓明 / 著

新 / 人 / 文 / 论

纪念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所罗门的瓶子

王晓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罗门的瓶子 / 王晓明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新人文论丛书书目)
ISBN 978-7-5675-2541-2

I. ①所…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9261号



著 者 王晓明
总策划 李庆西 黄育海
项目编辑 许静 陈斌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541-2/I·1248
定 价 42.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再版序言

李庆西 黄育海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

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轫，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

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从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

研究路径可能有过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 / 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

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赅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二〇一四年九月记

目 录

- 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论鲁迅的内心世界 1
- 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
——论茅盾的小说创作 32
- 过于明晰的世界
——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 76
- 在俯瞰陈家村之前
——论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104
- 所罗门的瓶子
——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 129
- 伟大人格的投影
——读《朝花夕拾》 150
- 读《沈从文文集》随想 161

在尖锐的抨击后面

——读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 170

艾芜和外国文学 179

另外一种散文

——读周作人的《乌篷船》 192

批评的幻想 197

文学和悲观 248

批评家的苦恼 253

对一种缺陷的反省 257

宽容与自信 264

关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再思考

——从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谈起 270

在语言的挑战面前 276

名词的蛊惑

——从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谈起 289

关于批评观的困惑 306

后 记 314

再版后记 324

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论鲁迅的内心世界

在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前二十年，鲁迅就已经辞世而去。可说来奇怪，今天谁要是提起他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常常不是他那几十篇出色的小说，而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笔下的那颗“国人的魂灵”，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总会要遇到不朽这个词，可究竟怎样的人才能不朽呢？首先当然是那些贡献出伟大创造的人，屈原因《离骚》而不朽，黑格尔因辩证法而永存。但是，历史的筛盘上也有例外，它并不只留存伟大的创造物。当专制和腐败弥漫人间，旷世奇才生不逢时的时候，它又到哪里去淘取颗粒硕大的精神晶块？造物主毕竟是公平的，如果杰出人物的精神能量不能向自己的创造物从容转化，它就往往以人格的形式直接显示自己。社会可以阻挠它创造物的形式，却无法禁止它以人的形象来标示历史。不是有人说，谁懂得鲁迅，就懂得了现代中国吗？从覆盖他灵柩的白旗上的三个大字：“民族魂”，我似乎悟出了“不朽”的另一层含义。历史固然有理由轻视个人，在天才和他的创造物之间偏爱后者，但如果是评判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却不能不特别注意前者。经过时间的淘洗，一切个人的言行都不免会黯然失色，

我们从个人的躯体内照见那卓越精神的蛰伏形态，也很容易会感到深长的悲哀。但这却正是历史的安排，它不但把自己的代表权授予那些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而且有时候也授予那些众说纷纭的独特人格。鲁迅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显然把精神作用看得很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都用人的精神状态来解释社会的变动^①，还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但他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决定论者，一旦涉及到具体的社会问题，他倒每每从物质的角度去衡量得失，并且告诫别人也这样做。他希望妇女能以天津“青皮”的韧性来争取经济权，在小说《伤逝》里更直截了当地宣告：“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孔夫子把“礼”说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的呆学生子路因此丧命，鲁迅却嘲笑说，倘若他披头散发地战起来，也许不至于被砍成肉泥吧？中国固然有注重“教化”的精神传统，鲁迅毕竟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深受科学思想熏陶，津津有味地捧读过《天演论》的现代人，他不可能不知道物质环境对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决定性影响，不会真以为靠几篇文章就能够起民众于蒙昧，他不是屡次说过，现在的民众还不识字，还无从读他的文章吗？现代中国的启蒙者中间不会再有过去的那种迂夫子了，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迂夫子。但是，他为什么又把“国民性”之类的东西看得那样重要呢？

① 他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和十多年后的《随感录·五十九》，便是明显的例子。

人类世界中似乎有这么一条法则，每一种活动虽然都有自己的原始动因，可一旦发展到高级的阶段，它自己的历史就会对它将来的趋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小至一场战争的胜败，大到一个民族的兴衰，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条法则尤其适用于人的精神活动，我们对一种新的刺激作出怎样的反应，正是取决于它和我们现有的全部认识形成怎样的关系。我们常常谈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一种被动性，一种对过去思维经验的身不由己的依赖性。一个人越是成熟，就越不愿听凭外部条件去左右他的认识方向，他总要执拗地按照自己最习惯，往往也是最擅长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这当然是表现了主观对于客观的独立性，可就主观本身而言，却又同时暴露了现在对于过去的依赖性。从鲁迅对精神现象的重视背后，我正看到了这种依赖性。

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鲁迅就陷进了家道陡落的窘境，祖父入狱，父亲早逝，在这一连串尚可估量的损失之外，他更遇上了人类交往中最模糊也最令人寒心的苛待：不是对你怒目圆睁，而是收起原先那见惯的笑容，另换一副冷酷的嘴脸，使你禁不住要对一切面孔都发生怀疑；不是由于你本人的情况，而是因为你身外某样东西的变化而改换对你的态度，使你发觉自己原来是一样附属品，禁不住感到惶惑和屈辱——鲁迅还是一个少年，就不得不独自咀嚼这份怀疑和屈辱^①，这是怎样深刻的幸？我不太相信中国古人对于苦

① 鲁迅的母亲回忆说：“在那艰难的岁月，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到多少人的歧视，甚至奚落。可他……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苦恼遭遇。”见俞芳：《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难的种种辟解，事实上，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份不幸的影响。倘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凿开一扇窗户去观察世界，童年时代的不幸就像是构成了鲁迅这扇窗户的窗框。正因为深悉 S 城人的势利和冷酷，刺心于本家叔祖们的欺凌孤寡，尤其是五十那一类亲戚的卑劣虚伪，^①他对百草园的热爱就没有能扩展成对大自然的敬慕，与水乡风景的亲近也没有培养出对田园意境的偏嗜，甚至他在南京和日本学到的科学知识亦未能牢固地吸引住他的注意力^②——对病态人心的敏感挤开了这一切。请看他一九二四年冬天的回忆：“我幼小的时候……是在 S 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据说她……亲见一罐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罐沿齐平了。”^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在我看来，这是鲁迅描画得最逼人的意象^④之一，那个腌臢的渍缸里，其实是装着多么可怕的愚昧！人的头脑中固然拥挤着形形色色的感觉和观念，但真正能扎下深根的却是那些潜踞在记忆深处的片断的意象。感觉本来就漂流不定，观念也常常会改换更新，惟有这种片断的意象始终如沉江的巨石，执拗地限定着人的精神底蕴。鲁迅的心灵是那样敏感而丰富，可至少在三十几年间，他萦怀于心的竟多半是“小鲫鱼”一类的阴暗记忆；看看他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吧，有心到童年去淘取愉悦的净水，却还是忍不住拽出了往日的余

① 见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 1953 年版。

② 他在 1907 年写《科学史教篇》，结尾却说：“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莎士比亚）……”

③ 《论照相之类》，《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④ 意象和印象不同，它由印象发展而来，凝聚着人对印象的主观理解。

忿。请想一想，从这样的精神底蕴上，他会形成怎样的认识倾向？

当然，仅仅用鲁迅少年时代的经验还不足以解释他的整个认识倾向。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感受远比他儿时的记忆丰富得多，他势必要根据新的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态度。如果鲁迅日后遭遇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他甚至有可能逐渐淡忘那往日的阴暗记忆。不幸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他成年之后的经历几乎时时都在印证他少年时代的心理感受，从在日本看的那场屠杀中国俘虏的电影，到一九二八年长沙市民踊跃看女尸的盛况，这些现实的见闻不断充实那些“小鲫鱼”式的意象的深刻涵义，以至当鲁迅把它们描绘出来的时候，它们早已不仅是往日的印象，而更凝聚着鲁迅现实的感受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循环，黑暗的现实不断强化他过去的阴郁印象，这种印象又使他对黑暗现象的感受特别深切，随着他那种洞察心灵病症的眼光日益发展，他甚至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的特殊习惯。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周围人们的精神病态常常构成了整个生活的最触目的特征。他以后越是目睹历史的停滞和倒退，越是失望于那些政治或暴力的革命形式，就越不由自主地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的各种精神缺陷，甚至到他们当中去寻找黑暗的根源。有位历史学家说，我们将带着旧神迁往每一处新居。就鲁迅的精神发展来讲，这旧神就是他童年时代的阴暗记忆，而黑暗的社会又在所有新居都为这旧神安放了合适的神龛，越到后来，新居的气氛还越合乎旧神的谕示，以至当鲁迅成年以后，对病态人心的注重几乎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认识习惯了。他当然不会被动地依从这种习惯。他有自己尊奉的哲学观念可以依赖，更有近在眼前的切身利益必须考虑，凭借这两者的帮助，他完全能够超越自己的认识习

惯。但是，他仅仅是能够超越而已，在他那些深层的心理活动中，在他对世态人情的具体感受中，在他观察社会的个人视角中——至少在这些方面，他仍然不能摆脱那种习惯。就在唯物主义观念逐渐支配他逻辑思路的同时，那尊旧神依然稳稳地坐在他心理感受的区域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却还会习惯性地“把国民性”看得很重。

我们从理性知识当中抽绎出一套对现实世界的完整理解，却又身不由己地要去体味另一些截然相反的生动印象。在许多时候，这种矛盾往往成为创造者的努力的出发点，可如果遇到分崩离析的黑暗时代，当历史和生活的必然性表现得异常复杂的时候，它却每每会成为先觉者的痛苦的总根源。人毕竟不能长期忍受认识上的分裂，他总要尽力把那些出乎意料的感觉都解释清楚，这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是能够把大部分感受至少在表面上协调起来的。可是，崩溃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他越是预感到山洪正在远处的群峰间迅速聚集，就越会对眼前这泥沼般的沉闷困惑不解。对现实的亲身体验非但不服从他对人生的理性展望，反而常常使他对这展望本身都发生了怀疑。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就是陷入了这种矛盾的深谷，左冲右突，精疲力竭。我甚至觉得，黑暗时代对先觉者的最大的折磨，就是诱发和强化他内心的这种矛盾。不幸的是，鲁迅正遇上了这种折磨，那个时代以他童年的不幸为向导，以他成年后境遇对这份不幸的强化为推力，一步步也把他拖进了这样的一条深谷。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对于人民的看法。当谈到大众的时候，似乎有两个鲁迅。一个是不无骄傲，认为“我们生于大陆……历

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①。并且引用报载北平居民支援游行学生的消息，有力地反问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诬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②对鲁迅来说，“人民”大概是最重要的认识对象了，他不会仅仅凭直接的印象就下判断，他势必要反复审视，要考虑到许多感性以外的因素。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决不会愿意否定大多数人的历史价值，他奋斗的目标正是为了唤醒人民，倘若否定他们，也就否定了自己。所以，只要能够抑制住悲愤的情绪，他就会以各种方式从整体上去肯定人民，那些为之辩护的话，正是他必然要说的。但还有另一个鲁迅，他满面怒容，竟认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③。即使到了晚年，无论是挖苦中国人“每看见不寻常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④，还是拿街头玩把戏的情形来比喻民众的甘当看客^⑤；也无论回忆绍兴“堕民”的“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⑥，还是由浙江农民的迎神惨剧而感慨他们“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⑦，都使人明显感觉到，那种对病态人心的心理直感仍然强烈震撼着他的灵魂，他好像仍然从“愚民的专制”的角

① 见1935年8月27日致尤炳圻信，《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此文中所引鲁迅信中语句，凡未注明版本者，均引自该书。

② 《“题未定草”·九》，《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通讯》，《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④ 《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⑤ 《观斗》，《伪自由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⑥ 《我谈堕民》，《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⑦ 《迎神和咬人》，《花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